

教育部面向21世纪
课程教材



政治科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

施雪华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
全国高等学校政治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政治科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

施雪华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科学原理/施雪华主编.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3
ISBN 7-306-01756-X

I. 政… II. 施… III. 政治学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8253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 84037215)

广东省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韶关新华北路 50 号 邮编:512026 电话:0751-8760690)

787 毫米×960 毫米 16 开本 65.375 印张 100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79.00 元

本书如发现有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由国内 22 所高校中一批有造诣的青年政治学者合作编写的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的教科书。本书适应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的需要，篇幅巨大，内容丰富，体系构筑新颖独特，深入系统地研究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绪论”概述政治与政治学的发展线索和发展规律；“上编”侧重于静态政治研究，主要阐述成为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的各种政治主体自身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各种政治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下编”侧重于动态政治研究，除阐述政治行为和政治过程的基本理论及实践问题外，主要分析政治主体的各种政治行为的特点以及政治过程的发展规律；“结语”研究政治的未来走向和政治科学的发展前景。

序 言

李 景 鹏

《政治科学原理》一书是由武汉大学施雪华教授主编，在一大批有造诣的青年政治学者共同努力下完成的。全书篇幅巨大，内容丰富。在众多的政治学原理类的著作中，希望这本书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应主编之托，要我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我个人才疏学浅，且从未写过序言，实难胜任。但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了。

这本书的问世，正好是处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因此，我想谈一谈有关面临着新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中国政治学本身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的问题。

首先是作为中国政治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面临的挑战。20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发达国家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及其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和新的民族冲突的发展等等，这一切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党论、政府论、民族论、政治家论、国际社会论等等，都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结合变化了的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各个部分内容重新进行阐释，对于各种现实问题给予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

的回答。

其次是来自西方政治学的挑战。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与我们不同，但是在我们的政治学处于冬眠时期的时候，面对现实生活所提出的许多新的问题，是他们首先给予回答的。因此，当我们的政治学在改革的春天苏醒过来之后，面对现实中的各种新的问题时，不免会感到茫然。这时我们就应该看一看在我们之前，人家是怎样回答这些问题的，从中找出可以借鉴的东西。但是，我们往往又囿于思想体系的对立而不敢或不愿意去借鉴人家的成果，从而使我们处于两难的境地。对于那些固守原有思维定势的人们，这种情况便形成西方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学的冲击和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政治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使我们既能从西方政治学中借鉴一切具有真知灼见的东西，又能保持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的阵地，就成为中国政治学者必须很好地给予回答的问题。

再次是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中国政治学的挑战。面对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新的问题，仅仅运用政治学原有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已经远远不够。而与此同时，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在这方面却有长足的进步。例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学科，它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新的问题，已经发展出许多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新的研究方法。这些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对于政治学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使得在困难中徘徊的政治学研究找到了许多新的路径，展现了推动政治学发展的广阔的前景。但是，这种情况对于固守政治学原有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人们来说，便形成了冲击和挑战。这种情况首先是在国外的政治学研究中发生的。一些研究者们为了回应这种挑战而发展出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一些新的学科。而现在，同样的情况又在中国政治学中发生。因此，中国政治

学者也面临着如何回应这一挑战的问题。

上述的这些挑战，对于政治学的研究者来说，是大家早已感觉到了的，问题在于如何更好地回应。除此以外，还有一种挑战可能是大家还没有很好地感觉到的，那就是市场经济对政治学提出的挑战。对这个问题，我想多谈几句。

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迁，从而使政治学不断地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样，政治学自身也应不断地更新其所研究的内容并需要不断地汲取新的观念。

那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有哪些观念对政治学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交易，市场经济中的一切观念都是从交易中引出的，也就是从交易的本质中产生的。而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市场经济中的第一个观念就是互惠的观念。任何的交易都是一种互惠的行为。交易双方在各自付出一定代价的条件下都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只有对方才能提供的东西。这种互惠性反映了在市场条件下人们之间在利益上的相互依赖性。过去我们在讲阶级斗争的时候所强调的主要是人们在利益上的排他性（而在劳动阶级内部又只强调利益的无差别的一致性），但就是不强调人们之间利益的相互依赖性。当然，交易也是以利益的排他性为前提的，否则就不需要交易了。但在这个前提下所要达到的则是互惠的目的。如果说在阶级斗争条件下人们的相互作用是一种零和博弈的话，那么，在交易的条件下人们的相互作用则是正和博弈。

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另一个观念是过程观念。即把与交易有关问题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是在当事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在过程之外发生的事，而且一切结果都取决于这种

相互作用的过程。作为交易的当事人，大家都是过程中的平等的参与者，大家都有相同的权利，而不受过程之外的其他力量的支配。每个人都作为交易的主体而相互作用，而不是一部分人是作用者，另一部分人是被作用者。这种相互作用的内容主要地就是讨价还价，或者叫做相互协商、相互协调。所以简单地说，所谓过程观念，就是以不受外力支配为前提的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协商的观念，或者叫做平等互动的观念。

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再一个观念是契约观念。这里所谓的契约就是交易双方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共同遵守的规则。所谓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是指它是建立在契约观念基础之上的规则经济，或者说是在这种规则之中运行的经济。离开了规则它就无法运行。而离开了相互信任也就无法建立起大家都愿意共同遵守的规则。

从交易的本质中所产生的又一个观念是世俗的观念。在交易中没有是非问题，而只有利益的协调与互惠的程度的差异。在交易中没有对真理和理想的追求，不存在真理的排他性和理想的神圣性问题。一切都是在平凡的、世俗的、追求实际利益的状态中进行的。在交易中没有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只有冷冰冰的利益权衡和现金交易。因而交易的过程是排斥任何浪漫主义和情感因素的。

从交易的本质中还会产生一个观念，就是追求增量创新的理念。每一种交易对于其他交易来说，都是一个增量的创新。而以新产品为对象的交易就更是增量的创新了。正是这种增量的创新，便使市场不断地扩大，从而带来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

所有这些观念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向纵深发展对于政治学都会产生影响和冲击，构成对政治学研究的挑战。

第一，互惠观念对政治学的影响。我们知道，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权力。这个概念所表示的是支配、控制、统治，等等。在支配、控制、统治中所强调的是支配、控制、统治的主体对相应客体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有效性。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排除客体的反作用，但是它总是被置于次要的和被压抑的地位的。在支配、控制、统治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是意志和利益的对流，即主体将意志施加于客体并从客体中吸收利益，而客体则接受主体的意志并向主体提供利益。这就是权力运行的基本原理。由此可见，在权力的运行中是完全不讲互惠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实的政治中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进行利益的协调的，是需要允许各方就利益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而且在许多有关利益的问题上，对社会最有利的解决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因此，就有必要将互惠的观念引进政治学中来。当然，引进互惠观念，并不能把权力现象从政治领域中排除，并不能消除支配、控制、统治在政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也不能消除完全对立的零和博弈的现象，例如，反腐败斗争、与各种犯罪现象的斗争、与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等等。但是，是否将互惠观念引入政治学，情况却大不一样。引入了互惠的观念，政治学就会将协调社会利益的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这就将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新的课题，为政治学充实新的内容。

第二，过程观念对政治学的影响。政治学虽然一般地也强调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但是，在政治过程中各种力量的所处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的。这和典型的交易中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生活中平等互动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纳入了以平等互动、相互协调为基础的过程观念，也并不是就排除了政治生活中原有的不平等现象。但这显然是政治观念的一种更新，并会对现实的政治产生重大的影

响。

第三，契约观念对政治学的影响。应当说，在政治思想史上，契约论的思想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的。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契约论在制定宪法和构建民主制度中都起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契约观念则很少有存在的余地。因为，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由利益矛盾所产生的相互嫉妒和猜疑代替了相互之间的信任，为了在利益冲突中获得胜利，一些人宁愿不择手段而不愿意遵守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为实际政治的运行注入契约观念就十分重要了。

第四，世俗观念对政治学的影响。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政治学开始被认为是一门科学。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更是将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政治学，使政治学俨然以一门严谨的科学自居。而中国的政治学走的是另外一条科学化的道路，即是使政治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相结合，从而也以政治科学自居。然而，科学的特点是以探索真理为目的的，政治学是不是这样的科学呢？在谈到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真理，一种是社会真理，另一种是自然科学的真理。社会真理指的是人类追求的一些终极的价值，例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等。而自然科学的真理则是指对于某一个问题的真实的、惟一符合客观事实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只能有一个，因而是绝对排他的。人们把政治学作为科学并不是从追求社会真理的角度来说的，而是从追求自然科学真理的角度来说的，因而也就是追求答案的惟一性了。自然科学的真理的答案之所以能够是惟一的，是因为其所研究的对象是纯粹的客观对象，也就是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因而是完全不可能反作用于观察者的事物。只有对这样的对象进行研究时，才有可能去追求答案的

惟一性，才称得上是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而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则不可能是这样的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是处于互动之中的。由于这种互动，就使得解决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双方互动或博弈的情况和结果，因而必然会出现多种答案。所以这样的政治过程，并非追求真理的过程，乃是寻求利益协调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对社会真理的追求，但是，社会真理只能对过程起指导作用，而不可能要求答案的惟一性。如果说人们关于自然科学真理的信念是不可妥协的话，那么，人们的利益和关于利益的价值观念却是可以妥协、可以协商的。如果是把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一定要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那么在政治过程中便不会承认任何对各种利益的协调，而只有真理和谬误的对立了。果真这样，那么，自认为掌握了真理的人们对于被他们认为是坚持谬误的一方就一定会是排斥、打击、分化、瓦解，而决没有讨论、协商和妥协的余地。因此，一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必定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学。其实，所谓政治不过是人们追求和实现利益的一种特殊的方式，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特定的关系。由于人们在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使人们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是非。站在不同利益立场上的人各有自己的“真理”。为了不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转化为严重的对立，导致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只能进行利益的协调、妥协和商讨。而这样做和自然科学中的那种坚持真理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这里完全没有坚持真理的那种排他性、神圣性和理想主义色彩，有的只是协调利益的务实性和世俗性。然而，正是这种平凡的利益协调，却能使现实的政治在一种稳定的和协调的状态中运行，而避免造成社会的动荡与分裂。另一方面，这种世俗性还表现在某些政治过程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交易过程。例如，政治家与选民之间、政

府官员与纳税人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的组织之间和不同的机构之间、不同的政治家之间和不同的官员之间、统治者与代理人之间等等的关系，都具有交易的性质。而这种具有交易性质的政治自然就更没有真理追求那种神圣性和理想主义色彩，而是充满了世俗性的。而这方面的政治在现实中却是大量存在的。

这里需要区分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的不同特点：传统政治的重要的特点是政治与道德的结合，从而使政治完全变成对社会真理的追求。这样的政治自然会带有神圣性和理想主义色彩。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才会遭到人们强烈的批评，被看成是对政治的道德传统的亵渎。但是，现代政治却有所不同。由于现代政治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主要面对的是协调社会利益和进行政治交易的问题。虽然，在进行利益协调和进行政治交易的时候也需要社会真理的指导，但这种利益协调和政治交易本身却完全是世俗性的，没有神圣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就使现代政治与道德变成两个各自独立的领域，二者之间虽然可以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但已不同于传统政治那种政治与道德的合一的情况。这就使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之间产生重大的差别。我们过去的阶级斗争政治，基本上还是没有脱离传统政治的范畴和框架，所以比较强调政治的神圣性和理想主义。然而，当我们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逐渐使政治从传统政治的范畴转移到现代政治的范畴中来，使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利益协调和政治交易这样的现实问题上来。当然，正如上面所说，交易从本质上说是排斥人们之间的情感因素的，使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冷冰冰的，这自然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但它并不能抵消利益协调和政治交易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而且，交易中的冷冰冰的面孔总要比人们在争夺利益斗争中的狰狞面孔要好些。当然，由此所引起的消极现象也是需要很好地解决的，但需要用交易之外的其他方式去解决，例如用文化、道德的方式去解决。所以，交易中所产生的世俗观念恰好是对政治学原有观念的一个重要的澄清与补充，可以帮助我们从传统政治转变为现代政治。

第五，追求增量创新的理念对政治学的影响。这方面对于过去比较重视存量增长即原有制度的发展、变迁的政治学来说，也是一种冲击。由于产生于交易的这一系列观念对政治学研究的挑战，使得政治学面临着是否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吸收这些观念的问题。如果政治学适当地吸收了这些观念，便会使政治学产生出一些新的内容来，从而使之有所发展。

政治学如果吸收了由交易而产生的各种观念将会产生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内容，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发展呢？

1. 如果政治学吸收了新的观念，它将会从注重追求真理的政治学转化为注重调节利益和政治交易的政治学。对于追求真理，如上所述，应该把社会真理和自然科学真理分开。社会真理即作为人类终极的价值的自由、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在政治学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这种关于政治哲学的研究对于现实的、微观的政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而另一种追求真理是指把政治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去追求答案的惟一性。但是在现实的、微观的政治的运行中，人们的利益差异和矛盾妨碍了人们对任何一种答案的共识。结果就变成了每个人、每个人群所追求的真理都是不同的，这当然也就无所谓真理的追求了。因此，现实的、微观的政治学，应该主要研究在社会中人们的利益的协调问题。这就包括各种不同利益的协调：如不

同人群之间、不同阶层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社会团体之间、不同信仰之间、不同的个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政府机构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协调，等等。所有这些利益协调问题都应该是现实的、微观的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政治学也应该注重研究政治交易问题，特别是研究在选举过程中的政治交易和政府官员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交易问题。政治学有这些内容和没有这些内容是大不一样的。它极大地关系到政治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从而关系到政治学的生命力问题。

2. 如果政治学吸收了新的观念，它将会从注重零和博弈的政治学转化为注重正和博弈的政治学。在以往的政治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中，由于时代使然，主要研究人群之间的斗争，例如，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国际斗争、政治家之间的斗争，等等。而这些斗争都属于零和博弈，即一方之所得，正是另一方之所失。这就意味着相互作用的双方在利益上是相互排斥的。这种排斥的极端表现便是所谓的“你死我活”。由于这种斗争状况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存在的，因此，在政治学中相应的内容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政治竞争就其性质来说，基本上也是零和博弈，而这方面的内容在政治学中也是大量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观念，即用交易中的互惠的观念来观察问题，那就是要创造条件，使各种事物的相互作用都尽量避免总和为零的博弈结局，而争取一个互惠的结局。如果大量的问题都能得到这样的处理，那么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好处。无论是国内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会因此而减少许多冲突与动荡，人民就会因此而少受许多痛苦。为此，就要把功夫下在如何为这种结局创造条件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研究：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将可以摆脱总和为零的博弈结局，而达到互

惠的目的。总的说来，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对于在博弈中有可能损失利益的一方如何进行某种利益补偿的问题。在这方面政治学过去很少研究。因为在零和博弈的格局下，人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博弈胜利者一方，而很少注意博弈失败的一方。而且往往把分出胜负看作是整个过程的结果。当然就不会考虑对博弈失败的一方进行利益补偿的问题了。但是，要使胜利的一方认识到应该给对方以利益补偿，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而艰巨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需要很好地研究的问题。然而，这正是新的观念下政治学所要面对的新课题。这方面，国际斗争会给我们提供许多启示。在当今的国际斗争中，虽然仍充满强权政治，虽然弱者仍经常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地位，但有一点是在国内政治中所缺乏的，即当今国际上已经形成一种要求对一切冲突进行政治解决即谈判解决的强大的舆论力量。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是任何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都不能毫无顾忌的。这种情况会或多或少地有利于在博弈中失败的一方。这虽然还谈不上对弱者的利益补偿，但总是向这个方向有所进展。而在国内政治中要做到这一点都很难。因为在国内政治中往往是“墙倒众人推”，因而几乎不可能形成对政治斗争中的弱者或失败者禁止“斩尽杀绝”的舆论，更不必说给予利益补偿了。在国际上之所以此问题还能有所进展，是由于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承认和重视。因而在国内政治中要想在这方面有所进展，就需要形成承认和重视个人主权的强大的舆论和文化。如何培养这种舆论和文化，就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突破口了。

3. 如果政治学吸收新的观念，它将会从注重统治和管理的政治学转变为注重参与的政治学。以往的政治学虽然也有大量的研究政治参与的著作，但是，政治参与的地位仍从属于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这方面在中国的政治学中尤其明显。这是由

于政府和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决定的。因而可以说，这种研究状况是与实际情况基本符合的。但是，从现代政治发展的方向来说，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人们曾经预言，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这似乎意味着政治参与的空间将会不断地缩小。实际的情况恐怕不会是这样的。即使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参与的空间的缩小。我们希望至少两者可以平行地发展。如果像上面所说的个人主权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真正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个人以及群体的政治参与在这个国家中就会产生一种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可能主要表现为在个人之间平等互动的基础上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助逐渐趋于平等。当然，这里所说的平等并不从根本上改变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仍然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权力运行的方向也仍然保持自上而下的特点。但是，作为自下而上运行的政治参与权力在每一种具体的相互作用中却应该与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之间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发展趋势在先发展国家已逐渐见其端倪。其最基本的保障就是个人权利在社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虽然在社会中有许多因素会妨碍人们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只要具备了这种平等地相互作用的条件，当人们一旦感到有参与的必要的时候，参与就会变得很容易实现。为了要把政治参与的问题在政治学中提到与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就需要为政治学注入新的观念。而从交易中产生的过程观念即一切结果都取决于在过程中平等互动的相互作用的概念，对于政治学就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从而可以帮助政治学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如果政治学吸收新的观念，它将会从注重政治行为的政

治学转变为注重制度创新的政治学。以往的政治学比较重视政治行为，特别是政府和政党的政治行为。因为在政治行为中，人民的政治参与行为，特别是在选举中的政治行为，只是在从属于政党的政治行为的意义上才被重视的。因此，政府和政党的政治行为便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了。不管是传统的政治学还是行为主义或后行为主义的政治学，都是把政府和政党的政治行为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政府和政党的政治行为到目前为止显然仍是现实政治的主要内容。但是，人们的行为，包括政府和政党的行为都可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或偶然性。更重要的是任何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因而需要能够对它进行约束。而且各种不同的行为之间还有可能发生冲突，等等。这样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就需要有一种能够规范政治行为的东西，这种东西便是制度，即各种各样的、不同形式的、大小不等的规则。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规则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适度的政治行为。如果是这样，当然就会对政治过程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而要想规范和约束政治行为，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问题是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呢？按照一般的思维逻辑，制度创新是要靠政府和政党来实现的。如果是这样，那就要陷入一种循环，也就是：政府或政党的行为只能靠政府或政党的行为来制约。不错，制度、规则的确需要由政府或政党来提供。但是，问题并不在此，而在于如何提供？关键就在于在政府或政党提供制度、规则的时候，必须要贯彻一种契约精神。这就是说，约束政府或政党的规则必须要真正取得人民的同意。而要取得人民的同意，就必须有人民的真正的、深度的参与。这样建立起来的规则才能真正称得上制度的创新。而这方面同上而提出的政治参与问题又结合起来了。不错，契约精神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很早就被